

网络现实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时代精神

□ 杪 楞

作为内容生态得到优化的重要标志，现实题材创作蔚然成风，这不仅为网络文学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也为推动网络文学精品创作拓展了新的路径。提高网络文学的整体水平，除了在语言表达、故事逻辑和叙事方法上需要讲求基本的文学规范外，更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这其中的关键是要主动对接时代，通过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萃取，将作品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价值追求与现实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结合起来，增强与时代生活和时代情感的契合度，以弘扬时代精神、传递时代价值。用白描式的手法书写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描绘人民群众为创造美好生活而拼搏奋斗的时代画卷，这些固然是时代精神在作品中的具象化呈现，但更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被看作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但具体到大众文学作品中，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形象化、细节化了的，它们蕴含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言行性格、理想追求、道德情感等方面，一般来说由主角及其周围“三观”一致或相似的人物所承载。传统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就是要通过人物的典型性来解决个别的和特殊的人物形象中显现出的一般性问题，其中时代精神是人物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图景。

时代精神内涵与人物的精神追求

网络文学中那些真正被读者肯定，“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佳作，共同特点都是都创造了一个或几个生动感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负载着时代情感，体现着时代生活中改革创新、奋发进取、诚信友善等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象。给读者讲一个好看的故事，这个故事要“好看”到能让读者自愿付费，这是网络文学赢取阅读市场的核心技巧，但这个“好故事”要紧贴人物来讲，作品的内涵与人物精神广度、深度是不可分离的。

晨枫的《重卡雄风》自去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被称作“硬核工业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西汽厂这个国有军工老厂摆脱发展困境，成长为跨国重型卡车制造集团的故事。题材本身的特色使小说在当下时代语境中迸发出了天然的价值光泽，国企改革与振兴、中国制造、科技强国和工业报国始终为社会所瞩目，企业的复兴之路正是这些重大时代命题的艺术化再现。作者虽然把改革精神作为推进故事情节和实现企业逆势崛起的根本动力，但首先将其内化为了人物的精神追求，用个体温度暖化了时代精神。小说塑造了老少两代汽车人的群像，林焕海、姜建平、郭志寅等算是老一代西汽人，他们思想不僵化不保守，为了振兴军工老厂不辞辛苦，敢打敢拼；他们培养了林超涵、王兴发、徐星梅等接班人队伍，对他们大胆锻炼和充分信任，最终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以林氏父子为例，林焕海被任命为厂长，为了向全厂表示决心，毅然让自己刚大学毕业、本可以留在部委下属单位工作的儿子林超涵回厂实习，将全家人与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进厂后，林超涵先是参加了极寒条件下的漠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学反映现实，阐释生活价值，彰显作家精神立场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文学已经诞生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人物形象，但其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依然不够，不少作品还存在‘将人物的个性消融到原则里’的问题，出现了概念化、标签化、机械化等现象。”

河试车，又瞒着父亲偷偷跟随车队参加高原赛车；当他在楚玛尔河畔目睹了陈培俊为救人牺牲的过程后，面对滔滔河水立下了“为中国的重卡事业奋斗终身”的雄心壮志。在振兴企业的过程中，他多次向父亲提出合理化建议，表现了青年一代应有的锐气、见识和责任感。小说对父一辈、子一辈将国企振兴和强国梦想变为现实的文学呈现，表达的正是新老工人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理想和情怀。

小说中的林超然作为主角，不仅挑起了故事主线，还承载和传递着作品所主张的价值立场、道德追求。在小说所褒扬的理想情怀和敢干肯干、不输的职业品质之外，他还被赋予了耀眼的道德光环，例如面对盗猎分子时的嫉恶如仇，对待与女友季容的感情忠贞不二，以及扶危济困地帮助徐星梅等人，体现出的都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传统道德情操。这一形象不仅让读者产生代入感，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精神，这也是网络小说从传统通俗文学继承而来的重要手法。

个体与时代在人物形象中交汇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从生活现场选取原型，具有为广大读者熟悉的生活角色和职业身份，例如《朝阳警事》中的警察，《大医凌然》中的医生，《糖婚》中的都市男女等，这些形象非常容易实现与大众的“共情”，进而产生社会影响。正是这些生动的“小人物”形象，诠释了个人成功与时代进步之间的必然关系。

何常在新的作《三万里河东入海》以几位年轻人的创业经历，反映新时代上海发展的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尽管以青年科技工作者关河的经历为主线展开叙述，但勾勒的是充满青春朝气和奋斗精神的青年群体形象。围绕关东生物公司的成立和运行以及关河的药物治疗研发进程，串起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既支撑起了故事，自身的主体特性也在故事中得到了建构，从而实现了人与事的统一。从主线上说，作者不仅赋予这些人物的千差万别的秉性，如关河迟钝木讷中的重情重义、海月明泼辣作风里的温柔体贴、万有略带阴险中的深思与谋断、靳里的爱慕虚荣、邓人和卫辛的不辨是非等，而且写出了人物伴随创业而表现出的成长性。以关河为例，他在美国羽而归，由于虚荣心作祟，从机场返回时担心出租车司机笑话自己住

在平房区，因此先打车到高档小区然后再坐地铁回到寒酸简陋的家中，方东与他分手就是因为他的“刻意伪装和不接地气的好高骛远”。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关河逐渐改变了自己，他专注于实验室的技术研发，成了“既懂技术又能掌控全局的核心人物”，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有了新的认知。像关河这样，小说叙事打在每一个人物身上的光束都折射出醒目的亮点。尽管他们在竞争中不乏勾心斗角乃至阴暗手段，但最终都选择了合作共赢和不离不弃，这也是小说重要的主题价值。

在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和创业经历与由上海发展所彰显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这种联系被融入了人物性格形象的形成过程中。关河的父亲关山没有抓住拆迁机遇一夜暴富，而是将中心地段的旧宅出售给靳里的父母，这使得二人的家庭状况呈现出相反走向，连带着影响到了各自的道德和性格。尽管以负面形象出现的靳里父母最终因为坐吃山空、穷奢极欲而负债累累，但他们确是凭借对社会巨变的敏锐嗅觉才得以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在关东生物的运营过程中，无论是科技研发还是资本运营以及公司办公地址的变迁，都是在上海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顺势而为。作者也多次在小说中直接描写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繁荣景象，结尾更预示着无限广阔的未来前景。但所有这些元素都被纳入到人物面对时代变化时的观察、感受和反应，正是受到时代精神的鼓舞，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心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这成为青年创业的根本动力，也恰是时代为他们所提供的先决条件。

文以载道是文艺的基本功能之一，与其他应用文体不同的是，文艺对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的传导不是说教式的、宣喻式的，而是形象化的、审美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学反映现实，阐释生活价值，彰显作家精神立场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文学已经诞生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人物形象，但其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依然不够，不少作品还存在“将人物的个性消融到原则里”的问题，出现了概念化、标签化、机械化等现象。



评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疆域辽阔，文化灿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众多有历史文化价值、有时代人生意义的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故事里的中国》图文并茂地以三个篇章再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故事、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故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故事”，向人们传达了具有史诗般恢宏的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故事里的中国》在第一篇章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标准，选取了有针对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逐一阐述。其中有越王勾践不忘国耻的《卧薪尝胆》故事、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发展的《文成公主进藏》故事、立法为民和扬善除恶的《约法三章》故事、为治理黄河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故事等。这些故事既有为国为民的国家形象，也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操守，还有修身正己的高尚品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互映衬，凸显了历史底蕴，彰显了时代特征，既有有理有据，也符合国情。

如果说第一篇章论述的是“中国价值”，那么第二篇章“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故事”阐发的就是“中国精神”，时间跨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百年历史。人们不会忘记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导致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会忘记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会忘记浴血奋战中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威震林海雪原的东北抗日联军、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少年英雄刘胡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更不会忘记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甘当螺丝钉”的时代楷模雷锋等。同

时，在“奋斗故事”中还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引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和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及在新世纪之交的港澳回归祖国怀抱、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等。这一系列重要事件和人物共同串联起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他们肩负着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责任，他们迸发的这种“中国精神”既深刻改变了国家，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书中的第三篇章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故事”，它讲述了把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变为现实的故事，其中有覆盖华夏大地、惊艳了世界的中国高速公路和中国高铁，中国自行研制迈向航天强国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世界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的升空，世界最大单口径、刷新人类已知最远观测距离的“中国天眼”，还有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航母“山东舰”，吹沙填海的南沙岛礁建设，中国海警海上维权行动，以及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等。

种种的复兴故事表明了中国人民所凝聚的强大中国力量，这种力量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我想“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用在这里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力量来自知识的积累，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的，没有知识积累就谈不上中国力量与国家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靠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昂扬的精神品格。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发展，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已成为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新名片，因此，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呈现。

关注

《国家至上》记叙了一件“国之重器”的研制历程，描绘了一幅为了“国家需要”而奋争的壮丽画卷，树立了一群秉承“国家至上”意志的光辉英雄形象，展示了一种为了“国家富强”不屈奋进的伟大精神，为某些领域和题材的纪实写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首先，较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有着较强的可读性，较好地把握理性与感性、纪实与趣味、真实与生动结合了起来，从而使读者能够较好地进入阅读状态，进而更好地完成审美体验。全书梳理了一条清晰的“国之重器”的研制之路，或者说引领读者一起重温了共和国“铸剑自强”的艰辛历程。作者从大的历史背景、政治形势和国际局势入手，充分展示了研制“国之重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随后，从国家的需要和战略部署出发，从研制队伍的组建和培养出发，切入参与者的个人历程，宏观而又细致地展示这一宏大事件的精神脉络。在这其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和工作环境，感受到了一群建设者、奋斗者的思想境界和崇高情怀，看到了一项大事业的各个时间节点，也跟随了这项大事业在不同的空间进行辗转腾挪。全书脉络清晰、条理清晰、进程清晰、情感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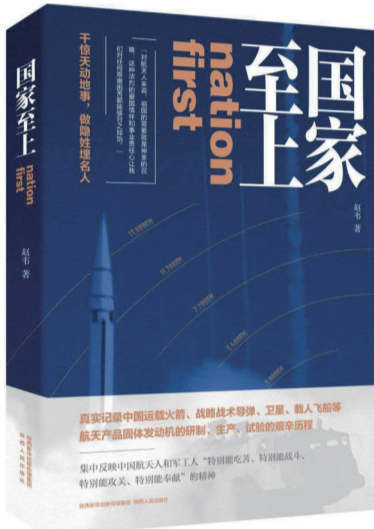
《国家至上》首先关注人的成长、关注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再蒙受欺凌屈辱，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利刃和坚盾，而且刻不容缓。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积贫积弱，不但在物质条件上很落后，而且缺乏有志有才的人，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作品从这里开始，记叙了以邢球痕为代表的一群热血青年，积极投身接受国防教育、跻身于国防建设的历程。这个切入点看似不那么宏大，实则最宏大，从这些原本对尖端装备制造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的学习和实践经历，让读者看到了在理想和信念激励下人的飞跃和进步。正是这样的描叙，不但让读者对国防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更加深了人们对国之重器研制艰难过程的理解。从描写这些年轻的学子开始，延伸到对进行教学的专家前辈的追忆，更加深了读者对于这一群体的敬仰。

时空推移的全面、连贯和顺畅，让整部作品与整个事业的发展紧密贴合。为了研制这些国之重器，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单是一个研制地点的选择，就需要进行多种多样的考虑。以前只知道进行这些研究是高度机密和需要保密的，《国家至上》让我进一步了解到，许多尖端装备的研制除了要考虑到安全因素之外，甚至还要考虑包括气候水土等诸多因素。从北京到东北、到内蒙古、再到四川、湖北，最后到陕西蓝田，这样的辗转挪移，看似是一个个地名，但实际上是一种艰辛与曲折。而在这几乎不间断的、高频度的、大空间的转移转换中，彰显着一代代国防建设者们的高度服从和绝对执行，彰显着在国家需要下的使命感，彰显着舍小家为大家、牺牲自我为国家的光荣与担当。一个工作区域的转换，且不说建设边研制边生产的艰辛，光是生活、家庭的无私奉献和牺牲，就足够让人尊敬。这其中引用了建设者们迁移地点之后撰写的诗句：“身在大庙胸怀全局，脚踏青山放眼世界”——所谓大庙，就是起初的工作条件，所谓青山，就是当时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一代英雄豪迈地喊出了“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的口号，克服了种种困难，为了国家需要默默奉献。尤其令人动容的是，由于迁移、战备、疏散等原因，许多家庭人各一处，丈夫与妻子分居两地，父母与孩子无法见面，孩子不能侍奉父母等，让这一代建设者有了许多的“亏欠”。但他们没有埋怨抱怨，而是服从国家安排、国家利益至上，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奋斗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这种精神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更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奉献与牺牲。

全书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地方，那就是文学形式的“科普”。对于尖端技术的阐释，要做到让读者看明白、把事情说明白，作者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的，也需要作者的专业性学习。如果写作者不是把自己变成相对的“内行”，那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内行”的东西。

《国家至上》描摹了一群奋斗者的形象，包括了群体与个体、精神与实际、崇高与实在。群像是几代人，包括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后的一群英雄们，个体是在群体之外，比较深入细致且一以贯之地描叙了一个个具体的奋斗者。“精神”是秉持着国家至上的理想，“实际”则是他们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的学习与探索、钻研与尝试等。崇高，是他们的的心声：“干这一行，不是要扬名天下，而是要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做贡献，要甘当无名英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等等，而“实在”则是写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血肉、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尤其重要，只有把英雄们写成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才能够真实可信。

《国家至上》让一个个英雄深入了读者的内心。作者用恭敬的态度和细腻的笔触，用整体的叙述和细节的刻画，用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国防安全、国家安全的一次深入的宣传与教育。通过这样一部著作，更可以引发我们对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的大事业、大功臣、大品类的书写的思考。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大事业，我们才能够获得大安全。正是有这样许许多多的大功臣，我们才有了更多的精神榜样。



鲜活的民间百态 深厚的文化记忆

——《望乡台》与民谣 □张 晨 冯 雷

《望乡台》是赵伟近年来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洋洋洒洒138万字，向人们展示了在巴蜀大山中望乡台下的四合院里赵氏祖孙三代跨越百年的生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望乡台》共100章，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首简短的民谣，还有一些民谣则穿插在作品的叙事中，这些民谣与小说的内容遥相呼应，从侧面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所包含、体现的母语文化，可谓《望乡台》重要的“副本”。

民谣版本众多，其中包含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良莠不齐。《望乡台》中的民谣显然经过赵伟的细心选择。事实上，相较于流传下来的民谣，逐渐消亡的民谣可能更多。而之所以有些版本的民谣能够不断流传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些民谣所宣扬的道德观念积极、健康、合理，更具有普世性。例如《望乡台》第五十七章中的民谣《十劝姐》，“一劝姐，初当家，莫学当初在娘家，月亮照几月呀，支人待客分上下……十劝姐，莫作恶，恶人还有恶人磨，月亮照几月呀，哪有恶人无奈何。还有一同出现的《十劝夫》：“一劝夫，莫嫌妻，戴花要戴头一枝，月亮弯几月，这山高来那山低。……十劝夫，听我言，知心话儿说不完，月亮弯几月，人不值钱话值钱”。在《望乡台》里，这两首民谣是在树兰和德辉成亲之日，众人在吃酒席之时唱班所唱的。前者是对女性的婚前教导，后者则是对男性的婚前训话，既是婚前教育，更有警示意义。当然，民谣不只是道德教化的内容，还有记录人们生活、习俗的内容。例如第五章前的《收麦歌》：“吡吡过活，割麦插禾。推米磨面，擀面烧馍。快收快割，不受饥渴。”这首民谣展示了收麦时的场景，也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质朴的愿望，即通过自己的劳动填饱肚子。而在小说里，望乡台的人们了解到南昌起义后时局

动荡，赵氏四合院里的人们也对未可预知的社会变动而感到忐忑不安。只不过，生活还要继续，大家照旧织布耕作，守望着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家园。当然，这些民谣大多又由生活情景而上升到价值观念的层面。例如第二十七章中的《十月怀胎》：“一月怀胎在娘身，无踪无影又无形，犹如田里浮萍草，不知定根未定根。二月怀胎在娘身，两脚无力路难行，新接媳妇脸皮薄，孩儿在身难知音……娘在房中叫肚疼，一阵痛来痛难死，二阵痛掉二灵魂。娘奔死来儿奔生，只隔阎王纸一层，玉母打开金成数，母子跳出鬼门坑。”小说里玉珍难产，昏迷三天三夜，被一声春雷惊醒后，众妇人去看望，大嫂陈氏有感而发所唱。这首民谣唱罢，勾起了女人们的怀胎感受，人人眼含泪花。不难想象，当母亲听到这首民谣的时候，会感慨自己十月怀胎的不易，更加爱护自己的孩子；当丈夫听到这首民谣的时候，会感慨妻子十月怀胎的不易，更加珍视、疼爱自己的妻子；当孩子听到这首民谣的时候，会感慨自己母亲十月怀胎的不易，会更加孝顺母亲。民谣大多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是民风、民情、民俗的“活化石”。《望乡台》所择取的民谣大部分是在巴蜀地区流传，例如第九章前的《响鼓》和第六十五章前的《打花牛》便主要反映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所以，这些歌谣可谓是农耕文明的一个缩影，是母语文化的珍贵载体，是文化记忆的重要显现。而《望乡台》民谣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晚清、五四以来的100多年间，现代社会与传统之间形成一个醒目的断层，承载着深厚传统的母语文化渐趋边缘，这已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小说中的赵子归对现实生活以及传统文化都曾有过质疑，机缘巧合之下得以游历美、加、英、法等国家，但是总找不到一个

适合他停留的地方。而最后他归国时，去机场接他的人问道：“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比中国的圆？”赵子归惭愧地答道：“年轻不晓事。”当他读到记录父辈历史的《回忆录》时，小时候爷爷奶奶在月亮下讲的故事渐渐穿越时空鲜活起来，他慢慢领悟到先辈们的呐喊抗争、驰骋厮杀、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让子孙过上幸福日子。一幕幕场景在他的脑海中一再浮现，不由得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最终，当他回到家之后，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听到那首《玉皇问》后，他的内心安定下来，漂泊的灵魂最终找到了归宿。这个过程，外在的是人物半生飘零的经历，而内在的其实正体现了文化认同。扬·阿斯曼曾谈到，个体对某个集体或文化的归属并不是自动生成的，也就是说集体认同感并不是天然和必然的，每个人都会受到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个体意识要转变成集体认同感要么需要借助例如仪式等外部手段，要么需要通过亲历、比较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及生活方式，然后方可意识到这种归属感的存在。而民谣的吟唱正是民族内部凝聚向心力的一个重要仪式，“非我族类”是很难参与其中、乐享其中的。这也恰恰是民谣的现代意义，是民谣沟通时空的特性所在。

作者赵伟谈到，“这些民谣百分之九十是现成的，少部分是我根据民谣的体裁风格以及文章内容契合创作的。民谣是古文化，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是我们思想的‘故乡’，而我的小说是现代故事，想用这种结构形成‘古今对应’的效果，也是一种‘望乡’，文化望乡。”由此可见，这些民谣虽然不是作品的正文，但的确承载了作者的文化思考、文化期待，而这些厚重的品质恐怕也正是《望乡台》值得重视的原因之一。